



● 作者/Stephen Kotkin ● 譯者/李育慈 ● 審者/黃依歆

現實主義的世界

Realist World: The Players Change, but the Game Remains

取材/2018年7-8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(*Foreign Affairs*, July-August/2018)

今日地緣政治與過去最大的不同，即中共崛起為亞洲權力平衡的要角。而美「中」關係則是老故事中的新橋段，雙方首度棋逢對手且難以預測孰勝孰敗。不過在持續相互競爭過程中，雙方都在避免兵戎相向。



地緣政治一去不復返；事實上它從未離開。歷史之弧朝向錯覺彎曲。每一個霸權都自認是終極霸權；所有世代的霸權都相信自己會地久天長。事實上，國家當然會有興盛衰敗，並在過程中不斷彼此競爭。而它們的作為決定了世界的命運。

從古至今，強權政治驅動事件發展，國際競爭則由競爭者的相對能力，亦即它們的人物力資本，以及有效治理自身與外交事務的能力所決定。這意味者下一個世紀的進程將受到美「中」關係及

兩者如何管理權力資源所主宰。

如同倡導自由貿易的大英帝國允許對手德意志帝國壯大，美國對中共也採取相同作法。自由主義霸權讓威權競爭者發展的邏輯在於，這些競爭對手勢必會面臨嚴酷的選擇：看是要維持威權主義並持續蕭條腐敗，抑或是選擇走向自由化以繼續成長。

美「中」貿易談判仍持續進行，這是美「中」競爭老故事的新橋段。圖為2019年2月美國代表萊特海澤(Robert Lighthizer，左)與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(右)會晤。(Source: AP/達志)

無論何種方式都對自由主義霸權有利。然而在美「中」關係中，有可能是首次不會有好結果，同時這一次看起來問題重重。

中共很快將在經濟上大幅凌駕美國。它至今尚未民主化，短期之內亦不會發生，因為共產主義體制不允許成功的民主化。然而，威權主義未必就與蕭條腐敗劃上等號，因為中共已成功管理菁英領導與貪腐、勝任與無能問題，並使國家得以繼續向前、向上發展。它的發展可能很快就會趨於遲緩，甚至從無數的矛盾中產生內爆。數十年來，分析家們皆如此預測，只是他們至今仍一直判斷錯誤。

於此同時，隨著中共權力發展大大超乎預期，美國及其他先進民主國家卻陷入內政功能失調，使它們的未來權力版圖令人存疑。這些國家的菁英分子成功引領數個世代的全球化，推動世界各地廣泛的社會流動與人類進步，而且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確實做得很好。但是當他們處於低潮期仍狼吞虎嚥毫不饜足時，卻忽略了這一切會對國內民眾造成負面的經濟與社會影響。最後，這為有心煽動者製造了報復的可乘之機。

全球化始於十九世紀末，因遭遇經濟大蕭條(Great Depression)隨之中斷。有些人認為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可能對當前全球化浪潮造成同樣影響。後來全球金融體系雖然存活了，但為拯救該體系所採取的緊急措施，包括對銀行而非對民眾紓困，凸顯並強化了該體系的內部矛盾。隨之而來的十年，反體制行動如火如荼地展開。

當前美「中」競爭是老故事中的新橋段。在十九世紀開始之前，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



體與最強大的國家，約占全球國內生產毛額的40%。接著它進入長期的衰退，遭逢內外交攻；約於此同時美國誕生了，且開始朝全球霸權的地位攀升。鑒於維持在亞洲的優勢地位向來是美國的要務，若無中共的衰弱，美國的崛起不可能發生。但若無美國提供安全與開放市場，中共亦不可能復甦。

因此，在各有優劣勢的情況下，這兩者皆主宰世界，且雙方是首度旗鼓相當彼此對抗。未來將如何發展，現在下定論還太早。但可以確信的是，這場競賽仍將持續下去。

當心所求

人云以古鑑今。在1970年代，美國及其盟友雖富有，卻失序與停滯；蘇聯在軍事上迎頭趕上，並持續整軍經武；中共則因國內騷亂與貧窮而動蕩不安；印度則比中共更為貧窮；巴西在軍政府統治下，經濟勉強優於印度；南非國土則在種族隔離制度下一分為二。

歷經冷戰的四十年之後，蘇聯最終解體，雖然其後繼者擁抱資本主義與私有財產，但中共卻在政治上持續採行共產主義，並選擇走向不同於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，從此逐步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。一度赤貧的印度如今也躍升為第六大經濟體；巴西成為民主國家並經歷經濟起飛，如今已是第八大經濟體。南非則廢除了種族隔離政策，成為多種族民主國家。

這些方向的轉變並非偶然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美國及其盟友致力於建立一個開放的世界，使貿易更自由並迎向更大的全球整合規模。制定

政策的人宣稱，只要他們建立這套制度，就會廣受人們歡迎。事實證明他們是對的，最終的成果相當豐碩。但是這些政策制定者及其後繼者卻沒有準備好回應這樣的成功。

全球化創造財富的方式，是鼓吹富裕國家的活躍城市往國外投資，而不是在國內的偏遠地區投資。這提高了經濟效益並取得絕對回報，或多或少符合傳統經濟學理論，並使數億民眾脫離赤貧，減少全球經濟不均。

惟於此同時，此類重新定向的經濟活動助長富裕國家內部的機會不均，並帶來政治上的背叛感。此外，對有些失敗者而言，隨著社會變得更加陌生，此種傷害隨著文化侮辱感而加劇。西方菁英忙著收割全球化利益的同時，忽略了減少全球化的成本，結果雖加速了整體過程，卻使分化的結果更嚴重。

有太多人堅信，全球整合基本上就是經濟與同化，而且勢不可擋。只有少數人採信如政治學家杭亭頓(Samuel Huntington)等悲觀預言家，指出文化才是更強大的因素，整合只會加深歧異而不會消弭差異，無論在國內外皆然。2004年，杭亭頓指出，「在當今的美國，相較於其他認同，在國家認同及美國在全球應扮演的適當角色上，菁英階層和一般大眾存有巨大歧異。大量菁英正逐漸背離自己的國家，而美國大眾則對政府愈來愈失望。」

此時很快地，「門外漢」政治企業家趁勢而起。

西方菁英擁抱了全球主義意識形態，卻因為早已捨棄多數決的民族主義而面臨大量政治挑戰。民眾不滿聲浪有可能是媒體偽造流傳，但選民的



許多人認為全球整合基本上是經濟與同化兩個要素所構成，僅有少數學者指出整合只會加深歧異。

(Source: Flickr/Suhas Dutta)

情緒卻是真真切切，並反映在許多重大議題上，這些議題是那些所謂專家們所忽略或不屑一提的。

歷史重演

除了一個關鍵的差異以外，

在上世紀所發生的各種重大變革後，今日的地緣政治版圖與1970年代甚至是1920年代相似。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的勢力式微但仍持續中？是的。在一個強盛但不負責任的歐洲，德國是核心？是的。心思渙散的美

國巨人雖然夠強大足以領導全球，但卻對此猶豫不決？是的。巴西與南非正統治所屬地區？是的。除了古印度、奧圖曼土耳其及波斯帝國的萌芽，現今最重大的差異就是中共取代日本成為亞洲權力平衡的關鍵角



中共在國際上取得新地位，一部分得力於美國過去提供的經濟開放與全球安全。(Source: Flickr/Dennis Jarvis)

色。

中共的勤奮令人吃驚，而它也確實取得新地位。但若沒有美國以自由主義霸權的身分提供經濟開放與全球安全，中共也不可能獲致過去兩個世代的成果。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，美國不像歐洲和日本，它相對較少對國外領土進行直接殖民統治。反之，它選擇透過自願的盟友、多邊機構及自由貿易擴張其利益。這種選擇主要受到「開明的自利」(enlightened self-interest)所驅使，而非利他主義，並奠基於其全球軍事優勢上。因此，各種戰後體系的多國組織與進程，事實上應是組織並擴張美國廣大新勢力範圍的機制，而不

是所謂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」的新幻想。

具有獨特意識形態的強國通常會試圖勸服他者，歸順者則傾向趨炎附勢。因此毫不意外地，在美國典範的影響力下(儘管美式理想較鼓勵打破而非遵守規範)，戰後時期的民主、法治及其他美國價值風行全球。但如今，隨著美國相對勢力減弱，美國招牌陷入困境，此一依賴美國勢力、能力與形象的體系遂暴露出脆弱性。

美「中」這兩個超級強權能否找到方法來管理相互競爭，以避免兵戎相見的結果？若終須一戰，則恐怕是因為臺灣因素。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，繁榮的臺灣也是另一個全球化奇蹟的明證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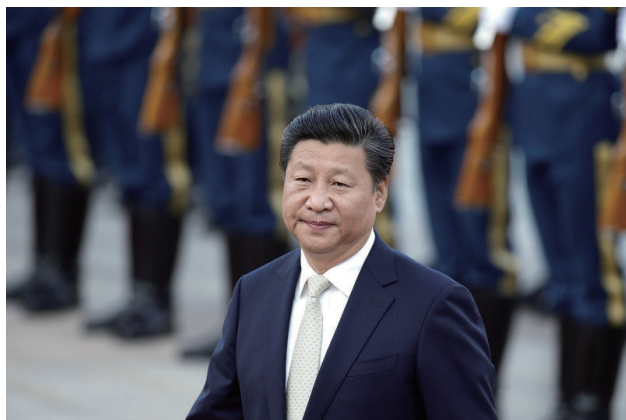
它從七十多年前平凡地發跡，逐漸富裕、強大並民主化。然而，北京堅持收復所有其視為歷史資產的領土，而中共主席習近平則不斷重申，臺灣是中共的領土與「核心利益」。另一方面，共軍也正不停累積以武力佔領臺灣的能力。

鑒於武力犯臺可能引發混亂，以及中共持續的內部成功取決於外部穩定，這樣的激進行動可能顯得瘋狂。惟臺灣民調顯示居民多傾向一個有別於大陸的臺灣身分認同，這與北京原本欲藉經濟融合所希望達成的結果相反(西方菁英分子不是唯一對此有錯覺的)。日益強大的北京是否將會袖手旁觀，讓煮熟的鴨子飛了？

現況為何

過去十年間，俄羅斯設法度過了油價崩跌與西方制裁，跌破大家的眼鏡。普丁政權恐怕是盜賊統治，但卻不僅止於此。即便是貪腐的威權政體亦能在若干關鍵領域展現持續的優良治理，聰明的宏觀經濟政策已使俄羅斯免於經濟困難。

中共亦是殘暴腐敗的威權政體，但事實證實其



中共威權體制因應危機方式是從上面拉緊韁繩。

(Source: Flickr)

適應性遠超過多數觀察家的想像。其領導高層使該政權以史無前例的速度與規模發展，致使許多人臆測中共是否將主宰世界。在1800年時，人們可能預期中國會主宰下一個世紀，但後來中國勢力瓦解、美國勢力扶搖直上。因此，直線式預測是危險的。但若這個十九世紀初的預測並非錯誤，只是太早了呢？

威權主義雖是權力在握卻是脆弱的，反觀民主政治顯得權力不足但卻極有韌性。中共一路走來穩健成功，但也可能在一夕間風雲變色。畢竟，毛澤東曾是這個政權的領導人，且是史上最為野蠻、自我毀滅的領導人之一。就像許多人曾認為中共不可能崛起至這般程度且如此快速，現在也有人認為中共崛起必然會持續下去，但這些預測都缺乏充分的理由。

習近平實行中央集權的決定有諸多考量，其中之一當然是體認到中共現正面臨極其艱鉅的問題。威權政體因應危機的方式是從上面拉緊韁繩。這能在短期內加強操縱局勢，且有時能獲得令人印象深刻的短期成效。然而，這從來不是真正長期成功的治理之道。

目前中共仍在龐大經濟規模的支撐下，繼續四處投射實力，從東海與南海到印度洋、中亞，甚至到非洲與拉丁美洲。當中共不斷投入財富之際，產出了日益驚人的軟實力與硬實力，使其能對敵人鯨吞蠶食。

例如，澳大利亞是富強的自由主義民主國家，具有高度的社會團結意識且為美國秩序的關鍵支柱，而這剛好成為中共擴張路徑上的一塊肥肉。北京在當地影響力與干預在新世代間穩定



成長，這是因為經濟互賴及中共長期蓄意鼓吹澳大利亞成為二十一世紀版「芬蘭化」的自然結果。隨著中共開始建立以北京為核心的大歐亞，類似的情況正發生於亞洲與歐洲，甚至可能使歐洲背棄大西洋。

前美國的衰退正為中共帶

來助力。然如同史密斯(Adam Smith)所言，「能毀滅一個國家的因素可多著。」美國至今仍是全球最強大的國家。再者，這將不是全然的雙邊競賽。沒錯，英國曾讓德國崛起並對其發起一場霸權競爭，而且發生了兩次，但英國也讓美國崛起了，因此當

這些競爭發生時，誠如邱吉爾(Winston Churchill)所言，「新世界會傾其全力幫助舊世界。」

同樣地，美國也允許中共崛起了，但亦助長歐洲、日本、印度、巴西及其他許多國家發展。即使這些國家可能繼續對美國的領導感到惱怒，或尋求中共



的投資，它們仍寧願維持現狀，並只有在被迫的情況下才對中共卑躬屈膝。

當前議題似乎是在不顛覆現行美國建立與主宰的國際秩序下，中共的影響範圍是否會擴大？但事實是木已成舟：中共的勢力範圍已無遠弗屆，且將繼續擴張。於此同時，中共的復甦已使其有權力成為規則制定者。因此，真正問題在於中共是否會對其他國家為所欲為（因為它能夠這麼

做），以及美國是否會分享其全球領導權（因為它必須這麼做）。

一個霸權的所有承諾是否共生依賴(co-dependent)，以致放棄一部分將破壞其他部分？是否能鬆開一處的同盟關係與承諾，而他處的同盟關係與承諾仍牢固不變？簡言之，退場是否可能？甚或只是一點點的退卻都會導致潰敗？無論政治人物與權威人士如何掙扎，美國從「霸權過動」(hegemonic hyperactivity)轉型為在核心利益上採取在全球各地選擇性介入，這種實際作為應該會受到國內外的歡迎。但和平退場的成功案例少之又少，況且沒有一個國家會在巔峰期這麼做。

歷史只會告訴我們未來往往出人意料之外。3D列印、人工智慧，以及來勢洶洶的數位與遺傳學革命，皆可能翻轉全球貿易，澈底破壞世界穩定。惟就地緣政治而言，好的結果亦可能發生，畢竟現實主義並不是一昧的悲觀以待。現今的競爭者要如同以往，致力翻轉逆境並避免兵戎相向，其中有四項因素不可或缺：一、西方政策制定者應設法使大多數西方民眾擁抱開放整合的世界，並從中獲益；二、中共政策制定者亦應透過妥協，繼續其和平崛起，而非威逼他國；三、在強力嚇阻與強力再保證上，美國應對中共保持精確的平衡，並妥善處理美國國內事務；四、最後，天佑臺灣。

作者簡介

Stephen Kotkin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與國際事務學系約翰·伯克龍榮譽教授(John P. Birkelund' 52 Professor)、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。

Copyright © 2018,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, publisher of *Foreign Affairs*. Distributed by Tribune Content Agency, LLC.

中共在龐大的經濟規模支撐下，透過一帶一路等區域合作四處投射實力。(Source: UN/Zhao Yun)

